

关于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几个事实问题——与韦路教授商榷

邓备

摘要

对于实证研究而言,事实至关重要。本文认为,由于数据库的时间覆盖不全以及研究不够细致,《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一文存在一些事实错误。本文发现,截止目前,中国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数量名列全球第六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传播学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同时,近年来我国学者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大陆学者有望成为我国学者中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生产的领头羊。本文提出,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过程应该清晰透明。使用数据库时,要密切关注其收录范围等相关信息。在对数据进行统计、辨别和分析的时候,需要特别细心。

关键词

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作者简介

邓备,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邮箱:dengbei@swun.edu.cn。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基于任务驱动的传播学研究教学探索”(项目编号:2019ZC20)的研究成果。

Dispute of Several Fa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f Mainland China'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Wei Lu

DENG Bei

Abstract

For empirical research, facts matter.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re are some factual err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f Mainland China'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ue to the incomplete time coverage of the database and the lack of carefulness in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up to now, Chinese scholars have ranked the sixth in the number of papers in SSCI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world, 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gun to emerg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age. At the same time, in recent year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scholars'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SSCI journal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ing, and mainland scholar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production of SSCI journal paper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rocess should be clear and transparent in empirical research. When using a database, scholars should keep close eyes on the scope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ake special care in the statistics,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Keywor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uthor

Bei De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E-mail:dengbei@swun.edu.cn.

This paper is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oject “an explor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eaching based on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 (project number:2019ZC20), which is supported b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一、研究缘起

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祝建华较早关注到这一现象,他认为,研究的国际化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与个人、机构的生存和荣辱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同时,他就传播学研究国际化提出一个操作定义:其研究结果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频率(祝建华,2002)。祝建华发现,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基本上与国际学术界相隔离。此后,部分学者从理论上探讨我国在传播学研究国际化中面临的挑战,强调了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金兼斌,2008;曾凡斌,2015)。同时,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贾鹤鹏,张志安,2015;陶海峰,2015;张志安,贾鹤鹏,2015;邓备,2017)。

最近的一篇相关实证文章是韦路在《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发表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韦路,2018)。文章认为,我国的传播学国际研究已经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同时还存在学科自主性不强、内卷化严重、原创性不足等问题。笔者总体上赞同该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但是,文中的一些事实或者证据并不准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点:一、该文使用的数据库,在时间范围上,没有全面覆盖,文中据此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二、在研究的细致程度上还有所欠缺,导致准确度不足。本文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中的一些事实问题提出商榷。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获取

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期刊是最为常用和重要的国际性核心期刊(金兼斌,2008)。从狭义上讲,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将其成果发表在国际性传播学刊物上,尤其是SSCI传播学期刊上。上文几篇关于我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状况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SSCI传播学期刊。本文中提及的传播学国际期刊指的就是SSCI传播学期刊。

《反思》采取的检索策略为: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传播学科的期刊论文(搜索条件为WC=Communication,文献类型为Article)。该文没有明确说明检索文献的时间跨度,只是提到检索时间截止2018年2月18日。

本文针对同样的数据库进行检索。

首先,笔者想了解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中国学者在SSCI传播学期刊的论文发表总体情况。检索策略如下:

来自WOS 核心合集;地址:(Peoples R China) OR 地址:(Taiwan) OR 地址:(Hong Kong) OR 地址:(Macau);精炼依据:WOS 类别:(Communication) AND 文献类型:(Article);时间跨度:所有年份。索引:SSCI。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各地学者的发表情况,笔者接着采取了下列策略:

来自 WOS 核心合集,地址:(Peoples R China) NOT 地址:(HONG KONG) NOT 地址:(TAIWAN) NOT 地址:(MACAU);精炼依据:WOS 类别:(Communication) AND 文献类型:(Article);时间跨度:所有年份。索引:SSCI。由此得到大陆学者在SSCI传播学期刊的论文(排除了与香港、台湾、澳门学者合作的论文)发表情况。在地址中,分别选择HONG KONG、TAIWAN 和MACAU,得到香港、台湾、澳门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情况。然后,分别在香港、台湾、澳门的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中,通过作者机构逐一查看其与大陆学者合作的论文。

本次检索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检索地点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媒体与新闻学院图书馆。该校购买的SSCI时间跨度从1900年至今,做到了全面覆盖。

三、研究发现

检索发现,截止2018年5月11日,历年来,中国学者在SSCI传播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为1832篇。在排除与香港、台湾、澳门学者的合作之后,大陆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的论文有500篇。分别在香港、台湾、澳门学者的SSCI期刊论文中,通

过作者机构找出与大陆学者合作的论文，检索发现，大陆与香港、台湾、澳门学者合作的论文分别有77篇、13篇和9篇，其中，3篇论文为多地学者合作完成。最终，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学者SSCI期刊传播学论文数量分别为596、758、560和41篇。论文数量之和超过1832的原因，主要是其中个别论文由四地之间的学者合作完成，分别计入各地。

1.中国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数量名列全球第六位

《反思》提出，截止2018年2月18日，在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传播学科的期刊论文，全球传播学论文发表总量50287篇。中国在全球名列第八。

表1：SSCI传播学期刊发文数量前十位的国家、地区

排名	国家/地区	论文数量	百分比	国家/地区	论文数量	百分比
1	美国	24788	49.293	美国	38577	54.65
2	英国	3726	7.409	英国	4083	5.78
3	澳大利亚	2738	5.445	澳大利亚	2703	3.83
4	西班牙	2446	4.864	加拿大	2017	2.86
5	荷兰	1817	3.613	荷兰	1899	2.69
6	加拿大	1751	3.482	德国	1469	2.08
7	德国	1472	2.927	西班牙	1351	1.91
8	中国	1226	2.438	中国	1228	1.74
9	韩国	964	1.917	韩国	957	1.36
10	以色列	795	1.581	以色列	924	1.31

（注：第2至4列为《反思》数据，第5至7列为笔者检索的数据）

采用相同的方式检索，笔者发现，全球传播学论文发表总量70592篇。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前10位的国家与地区与《反思》相同。

《反思》认为，中国虽然仅贡献了2.44%的论文，但也在全球名列第八。由于SSCI在统计中，把我国台湾地区单列出来，因此，这里的中国实际上没有完全包括台湾地区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显然，《反思》认为中国在全球名列第八的说法不够严谨。实际上，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学者在内，中国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数量可以名列全球第六位。

《反思》提出，中国大陆机构在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概排在全球15位左右。而笔者发现，香港、大陆和台湾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分别可以排到第13、14和15位。

2.大陆学者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始于1987年

《反思》认为，中国大陆学者1994年开始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首次

发表在《电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的这两篇论文，介绍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1987年，复旦大学陆道政作为第一作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在传播学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题目为《被动人数计数：第一步》（Lu & Kiewit, 1987）。这是大陆学者首次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据笔者所知，目前尚无其他学者明确指出，这篇文章是大陆学者首次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个时间，比《反思》认为的时间点要早7年。大陆学者发表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始于1987年，这在张志安和贾鹤鹏合作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中也有所提及（张志安& 贾鹤鹏，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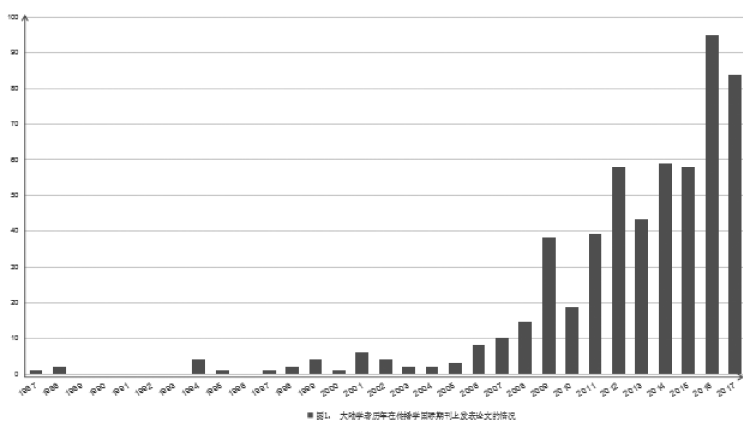


图1：大陆学者历年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

在1994年及其之前，大陆学者还有多篇论文刊发在SSCI传播学期刊上，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甘惜分在《传播学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撰文，回顾了国内新闻界的七次重大辩论（Gan, 1994），祝建华在其传播研究国际化的文章中，也提及此文（祝建华，2002）；复旦大学讲师俞璟璐探讨了1956年我国的新闻改革（Yu, 1988）。

《反思》认为，从发表数量上看，1994年到2006年是“滑行”阶段，2007年到2015年属于“起飞”阶段，2016年达到高峰。这个判断，非常生动形象。而笔者认为，将“滑行”阶段的起始时间变更为1987年至2005年，“起飞”阶段从2006年开始，这样更为准确。

多年前，李金铨评述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传播学研究状况，认为大陆人力资源充沛，假以时日，必有可观（王彦，2017）。本文证实了他的预言。

3.大陆学者与美国学者传播学国际期刊发表的时间差为72年

《反思》认为，全球传播学SSCI期刊发表的论文始于1950年的美国。中国大陆

学者的传播学国际发表则发端于1994年，我国与美国大约有半个世纪的差距。

SSCI创立于1973年，回溯收录了一些期刊1900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传播学SSCI期刊最早回溯至1915年的《公众演讲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Public Speaking），当年发表文章27篇。其中，有文章为美国学者所著，比如《作为教育机构的论坛》（Lyman, 1915）。如果以此为美国全球传播学SSCI期刊发表的时间起点，则我国大陆与美国之间国际期刊发表的时间差距为72年。

4.大陆学者SSCI 传播学科期刊论文被引用始于1987年

《反思》发现，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传播学国际期刊论文从2000年开始被引用，2009年开始起飞，之后快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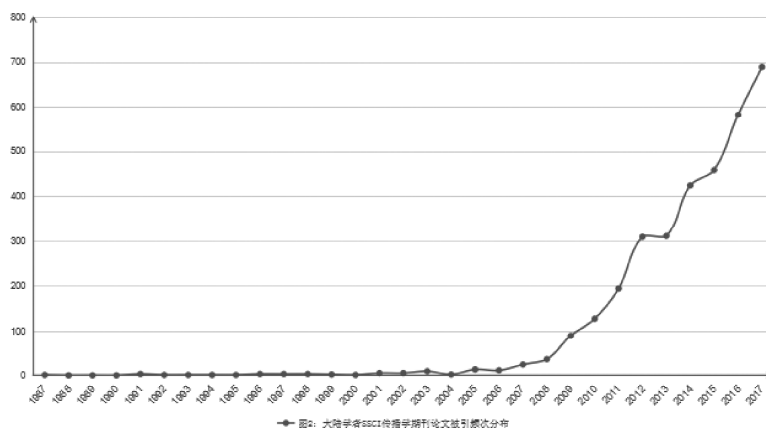


图2：大陆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被引频次分布

笔者发现，1987年复旦大学陆道政发表的文章，当年即被《在美国及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大众传播的文章》（Mckerns, Delahaye & Ostman, 1987）列入书目。SSCI视作此文被引用，列入计数。这是大陆学者在SSCI 传播学科期刊上的论文首次被引用，时间比《反思》所言提前13年。

直到2005年以前，大陆学者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次数都在个位数上徘徊。2005年起，超过10次，随后连续几年，被引次数大增。2010年起，被引用次数超过100次。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张晓林认为，通常情况下，文章被全球科学家引用得越多，说明关注度越高，影响也越大（齐芳，2014）。数据表明，近年来大陆学者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5.台湾学者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始于1972年

《反思》认为，与大陆学者一样，台湾学者也是1994年首次在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且发表在《电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的同一期。

笔者发现，台湾学者在1972年首次发布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该文介绍了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Hsu，1972）。这篇论文是中国学者最早在传播学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6. 香港学者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始于1975年

《反思》认为，香港学者在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时间最早，第一篇论文为香港中文大学李少南所写，1991年发表在《电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该文探讨了中国传播二元论现象。同时，《反思》认为，香港学者1998年发文开始突破1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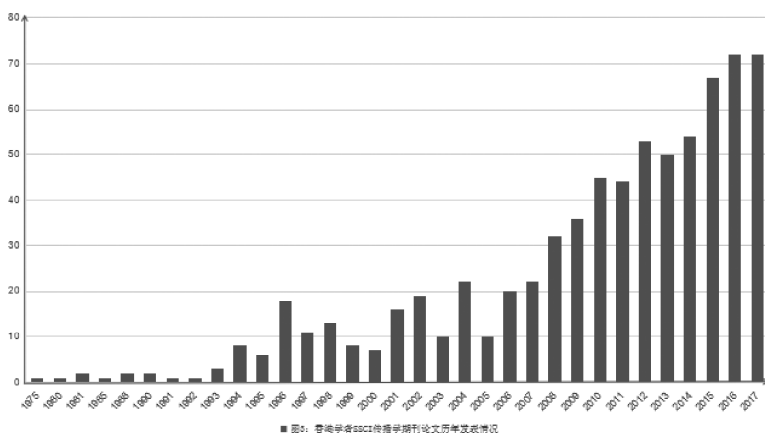


图3：香港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历年发表情况

笔者发现，1975年，香港学者Theodore J. Marr与肯尼亚学者Dennis T. Lowry（第一作者）合作，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发表论文《填充熵作为衡量国际传播理解程度的指标》（Lowry & Marr，1975），这是香港首篇传播学国际期刊论文，比《反思》所说的时间提前了16年。此论文的发表时间，比台湾学者晚了3年。

在发文数量上，1996年开始，香港学者发文数量超过10篇。此后，论文数量除了1999年和2000年之外，都在两位数以上，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7. 香港学者传播学国际期刊论文被引用始于1984年

《反思》认为，从1995年开始，有香港学者的传播学国际期刊论文被引用，2005年开始起飞，之后快速上升，到2017年达到1055次。

笔者发现，1984年，发表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论文《来源、目的地和熵：重新评估信息理论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Finn & Roberts，1984）引用了香港学者在SSCI期刊上首次发表的论文，这也是香港学者在SSCI传播

学期刊上的论文首次被引用。论文被引用的时间,比《反思》的发现提前了11年。

在1996年起,被引次数从之前的个位数直接增加到23次,此后,增速更加明显。可以说,从2004年开始,香港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上的论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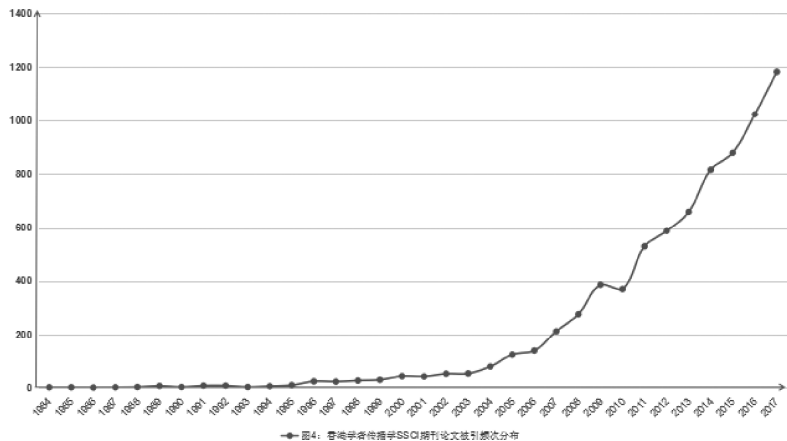


图4: 香港学者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被引频次分布

8.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论文的传播学SSCI期刊情况

《反思》认为,目前,SSCI传播学科共有79本期刊。检索发现,截止2018年2月18日,中国大陆学者在其中67本期刊上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占有所有期刊的85%。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在67种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就能得出占有所有期刊(79本)85%的结论。因为SSCI收录的传播学期刊一直在动态调整中,期刊的数量经常有变化。

9.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高产机构

从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高产机构来看,《反思》认为,复旦大学一马当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为第二梯队,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紧跟其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表现不俗。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中外合作大学。虽然创建时间不长,但其传播学国际期刊论文的生产能力不容小觑。笔者发现,宁波诺丁汉大学的SSCI传播学期刊发文数量排在大陆高校第8位。在《反思》的参考文献之一——《试论信息化环境下我国传播学发展趋势——2004—2013年SSCI传播类学术刊物的视角》中,该校也名列发文数量第8位。不知何故,该校在《反思》的前十位高产机构中不见踪影。

表2：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前十位机构

排名	机构	论文	机构	论文
1	复旦大学	51	复旦大学	54
2	清华大学	32	清华大学	36
3	浙江大学	31	浙江大学	32
4	中山大学	28	中山大学	30
5	北京大学	26	中国人民大学	29
6	中国人民大学	25	上海交通大学	28
7	上海交通大学	24	北京大学	26
8	中国传媒大学	17	宁波诺丁汉大学	19
9	北京师范大学	16	中国传媒大学	17
10	华中科技大学	16	华中科技大学	17

（注：第2-3列为《反思》数据；第4-5列为笔者检索结果）

四、结语

方汉奇先生在谈到新闻史的研究时，提出要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方汉奇，1996：3）。本人认为，对于实证研究来讲，事实（或资料）同样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本着求真求是的态度，对《反思》中的一些细节提出商榷，就教于方家。

诚如《反思》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猛。《反思》回顾了40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状况，检视其成败得失，发人深省，可资借鉴。只是由于数据库覆盖范围不全以及研究中的细致程度不足，导致《反思》一文存在不少事实性错误。这些错误，尽管不影响其主要观点，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值得商榷。

笔者发现，总体上看，截止2015年5月11日，中国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数量名列全球第六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边缘”逐渐登上“舞台”，崭露头角。同时，我国学者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不过，单从各地发表文章的数量上看，香港、大陆和台湾学者目前都没有进入全球前十的行列。从发表论文的时间来看，台湾学者于1972年率先在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比香港和大陆分别早3年和15年。大陆学者首次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时间比美国晚了72年。

虽然目前香港学者在传播学国际期刊上的发文数量还有一定优势，但是考虑到大陆学者的数量优势以及各个层面对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相信

不用多久，大陆就会成为几个地区中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领头羊。

对于和《反思》一样，利用学术期刊数据库进行的实证研究，笔者有三点建议：

第一，研究过程清晰透明。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研究要向自然科学研究看齐，研究过程应该是可重复的（风笑天，2018：8）。实证研究者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过程表达得更加清晰具体，以便其他研究者可以进行重复研究。《反思》除了在文章开头，给出具体检索条件，查得全球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发表的数据之外（未提供时间跨度），没有告诉读者其如何获取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学者SSCI传播学期刊论文发表的数据。由于数据收集过程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反思》的结论无法得到有效验证，也难免令人质疑。在通过数据库来收集数据时，图书情报学者们通常不遗余力地完整列出其在数据库中的具体检索步骤，值得传播学者学习和借鉴。

第二，使用数据库时，要密切关注其收录范围等相关信息。学术期刊数据库具有数据量大、检索方便以及容易获取等多重优点，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不过，研究者在享受数据库给研究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数据库收录的时间范围、文献类型、数据更新频率，等等。由于价格高昂，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购买国外的一些权威数据库时，往往不会在时间跨度上做到全面覆盖。比如，浙江大学图书馆的网上信息表明，其购买的SSCI收录范围是从1998年至今。因此，在使用数据库时，需要密切关注其时间覆盖范围、数据更新频率，等等，否则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甚至出现错误。

第三，由于数据量庞大，在进行统计、辨别和分析的时候，需要特别细心，注重统计数据的精确性。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在SSCI中，其名称为“诺丁汉大学中国校区”（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稍不注意，就会被误认为不是中国大陆的高校。也正因为如此，本文也不见得就没有疏漏乃至错误，笔者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责任编辑：胡宏超）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邓备（2017）。我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情况研究。《青年记者》，（36），46-47。
- 方汉奇（主编）（1992）。《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风笑天（2018）。《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贾鹤鹏，张志安（2015）。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中国问题——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

- 究。《新闻大学》，（3），10-16。
- 金兼斌（2008）。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路径、困境和前景。《新闻与传播研究》，（4），52-58。
- 齐芳（2014年8月19日）。如何看待全球高被引用率排名。《人民日报》，A006。
- 陶海峰（2015）。试论信息化环境下我国传播学发展趋势——2004-2013年SSCI传播类学术刊物的视角。《文艺争鸣》，（10），194-198。
- 王彦（2017）。《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成名与想象(1927-2006)——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朱立》。《国际新闻界》，39（5），85-108。
- 韦路（2018）。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154-165。
- 曾凡斌（2015）。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现状、环节与突破。《中州学刊》，（2），172-176。
- 张志安，贾鹤鹏（2015）。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5），5-18+126。
- 祝建华（2002）。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国际经验：个人学术训练与机构奖惩体制的影响。载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第157-17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Finn, S., & Roberts, D. F. (1984). Source, destination, and entropy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heor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11), 453-476.
- Gan, X. (1994). Debate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istic sci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38-51.
- Hsu, C. S., Maslog, C., & Cho, T. J. (1972).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sia: a symposiu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9(1), 116-128.
- Lowry, D. T., & Marr, T. J. (1975). Clozentropy as a measur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rehen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9(3), 301-312.
- Lu, D., & Kiewit, D. A. (1987). Passive People Meters: A First Step,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7(3):9-14.
- Mckerns, J. P., Delahaye, A. N., & Ostman, R. E. (1987). Articles on mass communication in U.S. and foreign journals: a selec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 April-Septembe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4(2-3), 664-674.
- R. L. Lyman. (1915). The forum as an educative agenc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1), 1-8.
- Yu, J. (1988). The abortive 1956 reform of Chine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 328-334.